

新农保补贴激励、政策认知与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 ——基于东北三省数据的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

金刚 柳清瑞

(辽宁大学 人口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根据新农保试点的跟踪调查结果,大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了最低的个人账户缴费档次。分析了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激励和政策认知程度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利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东北地区调查样本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在较高的政策认知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比“一刀切”方式显著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其政策含义是在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政策认知程度基础上,依据个人账户的不同缴费档次建立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以引导农民自发选择较高缴费档次,从而提高新农保替代率水平。

关键词:新农保 政策认知 补贴激励 缴费档次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2)04-0039-08

Subsidy Incentive Policy Cognition and Contribution Grade Choosing of Personal Account of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JIN Gang LIU Qing-ru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ollow-up survey about the pilot of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the majority of peasants had chosen the lowest contribution gra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 of policy cognition, financial subsidy incentive and the choice of the contribution grade of personal account using the positive test based on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and micro data of Northeast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financial subsidy can improve significantly peasants’ contribution grade choice compared with “one-size-fits-all” financial subsidy if they have higher policy cognition. It means that both the improvement of peasants’ cognition to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 by the “Difference” financial subsidy according to various contribution grade of the personal account are essential to improve peasants’ contribution grade choic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ensure necessary replacement rate of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Key words: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policy cognition; subsidy incentive; contribution grade

收稿日期:2012-02-02;修订日期:2012-04-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09&ZD023)、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研究(11&ZD014);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效应研究(11YJC840019);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应对研究”(12CRK010)。

作者简介:金刚(1976—),男,辽宁抚顺人,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社会保障;柳清瑞(1964—),男,吉林农安人,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社会保障。

1 引言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从2009年10月开始在全国进行试点,现在正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新农保采取“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的模式,目前多数地区设定了每人每年“100、200、300、400和500元”五个个人账户缴费档次,参保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地方财政对个人账户每年补贴不低于30元。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地参保农民选择的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集中在100元的最低档次,例如,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88%左右的参保农民选择了最低缴费档次100元(程昕、王国辉,2011),安徽省蒙城县选择最低缴费档次100元的人数占总参保人数的94.07%(黄明静,2011),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90%左右的参保农民选择了最低档次100元(潘书兰,2011)。个人账户对新农保替代率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据测算,按照100元/年的最低档次从16岁开始参保,个人账户能实现的替代率仅为11.8%左右(贾宁、袁建华,2010),而目前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水平实现的平均替代率仅为12.8%,这意味着即使从16岁开始参保,新农保替代率水平也仅为23%左右,而倘若考虑新农保试点中农民参保时间较晚的实际情况,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将更低,不足以农村老年人口提供有效的养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导农民选择较高的个人账户缴费档次,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多数地区对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实行“一刀切”财政补贴,即对不同缴费档次均给予相同金额30元的补贴。在“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下,参保者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就可以获得与选择其他较高缴费档次相同的补贴金额和基础养老金的领取资格,选择较高缴费档次不但不能获得额外收益,还会使高于最低档次的缴费额损失流动性。根据Hubbard(1984)、Samwick(1995)等的研究,养老保险缴费形成的个人账户储蓄流动性较低,个人会更偏好于流动性较强的私人储蓄。因此,“一刀切”补贴方式下,个人会由于对流动性资产的偏好而自发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许多国内学者也认为“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不足是引起目前参保农民集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如果将“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转变为对较高缴费档次给予较多补贴额的“差别化”补贴方式,由于农民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可以增加其一生收入,因此将能够有效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桑军,2011;王晓洁、王丽,2009;潘书兰,2011;程昕、王国辉,2011)。

但是,通过补贴激励引导农民选择较高缴费档次,是以农民充分了解新农保个人账户的运作机理和准确预期未来给付水平为条件的。由于新农保实施时间较短、农民群体接受能力有限等原因,部分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程度较低,无法准确判断个人账户的安全性与未来实际给付水平,即使对个人账户缴费实行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政策认知程度较低的参保农民可能依然选择最低缴费档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需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下参保农民不同的政策认知程度,以避免由于农民政策认知程度较低对“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实际效应造成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发现了政策认知程度对在特定项目中对个人储蓄额选择的影响,例如,王海江(1998)对山东泰安市两个村庄的农民进行的个案研究中发现,了解程度较低等原因引致农民对老农保政策的不完全信任,使农民的保费水平远低于纯经济决策均衡水平;Sherraden(2001)在针对美国“个人发展账户”^①的研究中,发现针对参与者的金融普及教育小时数在一定时限内(8-10小时以下)是影响个人月储蓄额的显著变量,随着教育小时数的增加,项目参与者会自发选择提高个人月储蓄额。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和针对东北地区新农保试点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新农保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激励和政策认知程度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在较高的政策认知程度下,补贴激励对于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才是有效的,如果政策认知程度过低,补贴

^①美国于1998年针对低收入人群建立的“个人发展账户”项目与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差别化”补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该项目鼓励个体就某项消费目标在某个时间段内(17-50个月)进行储蓄,并由美国13个机构对个人储蓄进行配款,配款比例(个人储蓄1美元可得到的配款额)从1到7不等,并对参与者进行金融普及教育。

激励并不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二部分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计量模型, 第三部分进行有序 Probit 估计并解释估计结果, 第四部总结分析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分析财政补贴激励和政策认知程度对参保农民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基于前述分析, 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具有激励新农保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的效应, 但是激励效应的有效性以参保农民的政策认知程度为条件, 只有在参保农民具有较高的政策认知程度之后,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才是有效的。为了对分析假设进行检验, 我们构建以下有序 Probit 模型并利用东北三省新农保调查数据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进行分析:

$$\text{Contri}grade_i = \alpha_0 + \alpha_1 \cdot \text{Subsidymode}_i + \alpha_2 \cdot \text{Cognition}_i + \beta \cdot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首先, $\text{Contri}grade_i$ 表示参保农民选择的个人账户缴费水平。新农保制度规定了整数化的个人账户缴费档次, 我们使用的样本中参保农民所在地设置的缴费档次为 100、200、300、400、500 元等 5 个档次, 因此, 建立虚拟变量 $\text{Contri}grade_i$, 并分别赋值为 1-5 的整数, 1 代表 100 元缴费档次, 2 代表 200 元缴费档次, 3 代表 300 元缴费档次, 4 代表 400 元缴费档次, 5 代表 500 元的缴费档次。上述五个缴费档次是典型的离散变量, 采用概率模型分析离散选择问题是理想的估计方法。并且, 反映缴费档次的离散变量是超过两类的有序离散变量, 因此我们选择了有序 Probit 模型(Ordered Probit) 作为分析工具。用有序 Probit 模型处理多类别有序离散数据是近年来应用较广的一种方法, 其基本方法是假设存在一个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 y_i^* , y_i^* 与解释变量存在线性关系, 在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假定下,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

其次, Subsidymode_i 表示参保农民所在地对个人账户缴费采取的财政补贴方式的虚拟变量。令 $\text{Subsidymode}_i = 0$ 代表参保农民所在地对个人账户缴费采取“一刀切”补贴方式, 令 $\text{Subsidymode}_i = 1$ 代表参保农民所在地对个人账户缴费采取“差别化”补贴方式。 Subsidymode_i 的系数是我们所主要关注的, 如果“差别化”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是有效的, 那么, Subsidymode_i 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再次, Cognition_i 表示参保农民对新农保个人账户的认知程度, 调查中我们设计了问题“您对个人账户的了解程度”, 选择答案包括“非常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和“完全了解”五个档次, 分别赋值 1-5 的正整数, 其中 1 代表非常不了解, 2 代表不太了解, 3 代表一般, 4 代表比较了解, 5 代表完全了解。

最后, 在有序 Probit 模型中控制了可能影响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的其他因素, 包括居民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承包地面积等、家庭收入年剩余等。居民性别记为 gender , 男性赋值为 1, 女性赋值为 0; 年龄记作 age , 是居民在调查时的周岁; 健康状况记作 health , 包括农民认为自身健康良好、一般和较差, 良好赋值为 3, 一般赋值为 2, 较差赋值为 1; 教育水平记作 education , 是居民在被调查时的学历程度, 包括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专)、大专及以上, 分别赋值 1-5 的正整数; 家庭人口数记作 homesize , 为居民被调查时的家庭人口数; 承包地面积记作 contracted , 为居民被调查年度家庭承包地面积; income 表示家庭年收入剩余, 为居民被调查上一年家庭总收入减去年支出, 包括 5000 元以下、5001-10000 元、10001-15000 元、15001-20000 元、20001-30000 元、30001-50000 元、50001-10 万元、10 万元以上等 8 个档次, 分别赋值 1-8 的正整数; 此外, 考虑到居民所在地的整体特征可能对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产生影响, 还构造了相应的区域虚拟变量 location 。

我们分别对总体样本以及按照不同政策认知程度分组样本进行有序 Probit 估计, 以确定政策认知程度和“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效应。我们推断, 较高政策认知程度组中“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可能是显著的, 而较低政策信任认知程度组中“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可能是不显著的。

表1 调查样本点分布状况

省份名称	县市名称	乡镇名称	样本数	财政补贴方式
辽宁省	阜新市彰武县	平安乡	352	一刀切
		丰田乡	389	一刀切
	阜新市阜蒙县	于寺乡	376	一刀切
吉林省	四平市梨树县	白山乡	223	差别化
		林海镇	256	差别化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通河县	通河镇	337	差别化
		岔林河镇	172	差别化

表2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缴费档次	2103	1.31	0.98	1	5
财政补贴方式	2103	0.47	0.50	0	1
政策认知程度	2103	2.69	0.98	1	5
性别	2103	1.39	0.49	1	2
年龄	2103	43.55	9.52	16	59
教育水平	2103	2.89	0.77	1	5
健康程度	2101	2.61	0.62	1	3
家庭人口数	2103	3.83	1.38	0	10
家庭承包地面积	2103	20.77	15.97	0	246
家庭收入水平	2103	1.44	0.88	1	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课题组对新农保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整理。

县的通河镇与岔林河镇。调查采取随机入户、一对一访谈并由调查员现场填充问卷的方式,每户选择1-2名家庭成员进行访谈。问卷主要分为农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就业与流动迁移情况、收入与消费情况及

表3 参保农民缴费档次的分布情况

	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					平均值 (元)	观测值数 (个)
	100元	200元	300元	400元	500元		
全部样本	89.11	2.76	2.14	0.24	5.75	130.77	2103
“一刀切”补贴地区	90.87	2.78	1.79	0.18	4.39	124.44	1117
“差别化”补贴地区	87.12	2.74	2.54	0.30	7.30	137.93	98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课题组对新农保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整理。

表4 参保农民对新农保政策认知程度的分布情况

	非常不了解(%)	不太了解(%)	一般(%)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平均值	观测值数
全部样本	7.80	40.32	31.95	15.12	4.80	2.69	2103
“一刀切”补贴地区	7.52	40.20	32.14	15.58	4.57	2.69	1117
“差别化”补贴地区	8.11	40.47	31.74	14.60	5.07	2.68	98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课题组对新农保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整理。

表2为本文使用的变量的统计描述,表3和表4是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分类别的统计分析结果。从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来看(表3),选择最低缴费档次100元的参保农民比重最高,占89.11%;其次为500

3 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为了对新农保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需要分别选取实行个人账户“一刀切”和“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地区中参保农民样本。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辽宁大学针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中国农村保障水平研究”于2010年针对东北三省开展的一项抽样问卷调查。辽宁省(除大连)实行的是个人账户“一刀切”财政补贴,具体内容为对各个缴费档次均给予30元的财政补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实行的是多缴多补的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具体内容为“100元补贴30元、200元补贴35元、300元补贴40元、400元补贴45元、500元补贴50元”。东北地区三个省份在个人账户缴费财政补贴方式上的差异,为我们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可能。本次调查中,辽宁省选择的调查地区为阜新市彰武县的平安乡与丰田乡以及阜蒙县的于寺乡,吉林省调查地区为四平市梨树县的白山乡与林海镇,黑龙江省调查地区为哈尔滨市通河

县的通河镇与岔林河镇。调查采取随机入户、一对一访谈并由调查员现场填充问卷的方式,每户选择1-2名家庭成员进行访谈。问卷主要分为农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就业与流动迁移情况、收入与消费情况及新农保的参保情况等四个部分,其中,针对新农保制度,我们设计了是否参保、个人缴费档次选择、参保意愿与续保意愿、对新农保个人账户的了解程度、对新农保制度的态度等多个问题。本次调查共获取问卷3218份,去除60岁以上已领取基础养老金的老人样本、未参保人群样本以及遗漏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其他无效样本,我们共获取有效样本2103份,其中,辽宁省1117份、吉林省479份、黑龙江省507份,见表1。

元档次,占 5.75%,以下依次为 200 元档次、300 元档次、400 元档次。“一刀切”补贴地区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略高于“差别化”补贴地区,前者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参保农民比重为 90.87%,后者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参保农民比重为 87.12%。从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程度来看(表 4),参保农民对新农保的政策认知程度偏低,选择对个人账户“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和“一般”的参保农民比例达到 80% 以上,而选择对个人账户“比较了解”和“完全了解”的参保农民比例仅为不到 20%,总体来看政策认知程度平均水平处于“不太了解”和“一般”之间,但接近“一般”水平,并且,“一刀切”补贴地区与“差别化”补贴地区中参保农民的平均政策认知程度接近。

表 5 总体样本及按照政策认知程度分组样本的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1) 全部样本	(2) 政策认知程度 为“完全不 了解”的样本	(3) 政策认知程度 为“不太了 解”的样本	(4) 政策认知程度 为“一般”的 样本	(5) 政策认知程度 为“比较了 解”的样本	(6) 政策认知程度 为“完全了 解”的样本
财政补贴方式	0.184 (1.47)	-0.176 (-0.29)	0.058 (-0.26)	0.147 (0.5)	0.486* (1.66)	1.552*** (3.41)
政策认知程度	0.398*** (9.08)					
性别	-0.003* (-0.03)	-0.785*** (-3.18)	0.312** (2.31)	-0.799*** (-3.35)	0.177 (1.03)	-0.524* (-1.94)
年龄	-0.006 (-1.45)	-0.014 (-0.78)	-0.008 (-1.15)	-0.004 (-0.46)	0.001 (0.07)	-0.013 (-0.87)
教育水平	0.137*** (2.72)	0.149 (0.80)	0.171** (1.99)	0.593*** (6.01)	0.158 (1.51)	-0.032 (-0.19)
健康水平	0.045 (0.65)	-0.294 (-1.53)	0.212* (1.83)	-0.242 (-1.49)	0.148 (0.94)	-0.283 (-1.04)
家庭人口数	0.049* (13.10)	0.002 (0.02)	0.004 (0.08)	0.257*** (3.24)	0.060 (-0.94)	-0.121 (-1.21)
承包地面积	-0.002 (-0.99)	-0.28* (-1.67)	-0.001 (-0.24)	-0.014* (-1.72)	0.006 (1.50)	0.020* (1.8)
家庭收入	0.061 (1.56)	0.450* (1.71)	-0.134 (-1.57)	0.038 (0.51)	0.231*** (2.78)	0.090** (1.97)
所在地区	-0.002 (-0.31)	-0.008 (-0.39)	-0.001 (-0.08)	0.002 (0.16)	0.001 (0.09)	-0.007 (-0.34)
观测值数	2101	164	846	672	318	101
瓦尔德统计值	Wald chi2(10) = 116.96***	Wald chi2(9) = 35.34***	Wald chi2(9) = 15.91*	Wald chi2(9) = 55.26***	Wald chi2(9) = 23.19***	Wald chi2(9) = 39.17***
对数似然值	-884.94	-49.54	-267.32	-176.76	-208.37	-76.04
伪拟合系数	0.0903	0.1003	0.0268	0.1318	0.0563	0.1982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 t 统计量,根据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计算;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低于共线性存在的阈值 0.7(Lind et al., 2002)。

“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总体上看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并不能比“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显著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但是,总体样本中“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无效,很有可能是由参保农民整体政策认知程度较低引起的,为了分析不同政策认知程度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实际效应,我们进一步按照政策认知程度对样本分组并进行估计。按照政策认知程度分组的回归结果(列 2-6)显示,政策认知程度较高的“比较了解”和“完全了解”样本的“财政补贴方式”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政策

3.2 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利用 Stata11.0 软件对式(1)进行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由于参保农民的政策认知程度可能对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总体样本分析的基础上又按照参保农民的政策认知程度分组进行估计。计量分析结果见表 5。

从表 5 中数据来看,总体样本中(列 1)“财政

认知程度较低的“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和“一般”样本的“财政补贴方式”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述的研究假设,即政策认知程度对“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具有影响,只有在较高的政策认知程度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才会起到引导农民自发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效果。

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反应袭掉程度提供了经验验证用的数据来自辽宁大学和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我们进一步将总体样本分为两组,第一组为较高政策认知程度组,包括政策认知程度为“比较了解”和“完全了解”的样本,第二组为较低政策认知程度组,包括政策认识程度为“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和“一般”的样本,并分别进行有序 Probit 估计。两组样本的计量分析结果见表6与表7,在回归结果中,还同时列出了各解释变量对不同缴费档次选择概率的影响即边际效果。

表6 较高政策认知程度组有序 Probit 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 回归结果	较高政策认知程度组样本	包含控制变量的边际效果				
		100元	200元	300元	400元	500元
财政补贴方式	0.827*** (3.50)	-0.264*** (-3.64)	0.037*** (3.08)	0.027** (2.54)	0.007 (1.54)	0.193*** (3.54)
政策认知程度	1.238*** (8.23)	-0.394*** (-7.97)	0.060*** (4.12)	0.043*** (3.30)	0.011* (1.70)	0.280*** (7.24)
观测值数	419					
瓦尔德统计值	Wald chi2(10) =95.78***					
对数似然值	-298.48					
伪拟合系数	0.1635					

注:***、**、*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t统计量,根据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计算;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低于共线性存在的门槛值0.7;控制变量的计量分析结果略。

表7 较低政策认知程度组有序 Probit 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 回归结果	较低政策认知程度组样本	包含控制变量的边际效果				
		100元	200元	300元	400元	500元
财政补贴方式	-0.118 (-0.72)	0.014 (0.72)	-0.004 (-0.72)	-0.004 (-0.72)	-0.0003 (-0.66)	-0.006 (-0.72)
政策认知程度	-0.116 (-1.61)	0.014 (1.61)	-0.004 (-1.50)	-0.004 (-1.55)	-0.0002 (-1.14)	-0.006 (-1.63)
观测值数	1682					
瓦尔德统计值	Wald chi2(10) =33.97***					
对数似然值	-523.94					
伪拟合系数	0.0265					

注:***、**、*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t统计量,根据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计算;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低于共线性存在的门槛值0.7;控制变量的计量分析结果略。

表6中数据显示,较高政策认知程度组变量“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如果政策认知程度较高,则财政补贴由“一刀切”方式转变为“差别化”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的研究假设。从边际效应来看,较高政策认知程度组中,如果财政补贴由“一刀切”方式转变为“差别化”方式,将能够使参保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100元的概率平均下降26.4%,而选择200-500元档次的概率分别提高3.7%、2.7%、0.7%和19.3%。财政补贴方式的转变对参保农民选择较高档次中的最高缴费档次概率的影响效应最大,这意味着,如果参保农民选择较高档次,其最有可能选择的是最高缴费档次。由于在较高政策认知条件下,农民能够准确判断“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对其一生收入的正向影响,

从最大化一生收入的角度出发,参保农民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最高缴费档次以获得最高的财政补贴,因此,“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对选择500元/年的最高缴费档次的边际影响最大,更加证明了较高政策认知程度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有效性。表7中数据显示,较低政策认知程度组中“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不显著,从边际效果来看也是不显著的。表6与表7的估计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在参保农民

对新农保制度具有较高政策认知程度的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能够有效激励参保农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而如果参保农民的政策认知程度较低,“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不足。同时,不同分组样本中“政策认知程度”变量的系数也显示出规律性,较低政策认知组中“政策认知程度”变量的系数不显著的,而较高政策认知组中“政策认知程度”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政策认知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政策认知仅在较小的幅度内发生改善,并不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综合总体样本中“政策认知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的情况,“政策认知程度”必须从低水平开始发生较大的改善才能够有效提高参保缴费档次选择。

3.3 估计结果的解释

如果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采取“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并且补贴水平高于个人储蓄的利率,个体为最大化其一生收入的理性行为是在收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力所能及的最高缴费档次。而如果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采取“一刀切”的财政补贴方式,并且个人账户资金收益率与个人存款利率相同^①,由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蓄的流动性较差,个体的理性选择将是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并将其余的生命周期储蓄配置在其他流动性较强但收益率等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收益率的私人储蓄上,这种选择将使个体在不降低资产流动性情况下,获得与选择较高缴费档次条件下相同的一生收入。从这个角度分析,“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下,最低缴费档次将是参保者的理性选择结果,而“差别化”财政补贴将使参保农民选择的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档次,显著高于“一刀切”财政补贴条件下的缴费档次。

但是,前述分析实际上隐含了完全预期假定,即个体在做出缴费选择时能够完全确定自己在老年期末将能够拥有的资产数量。而在引入新农保制度之后,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程度不一,如果参保农民对新农保个人账户的政策认知程度较高,即农民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个人账户的运作机理、补贴政策 and 给付规定等内容,那么参保农民将能够对个人账户的安全性、积累额以及未来给付水平做出正确预期,从而对不同缴费档次对一生收入的影响做出合理判断并做出理性选择;如果参保农民对个人新农保的政策认知过低,使其对个人账户的安全性、积累额及给付水平的预期可能低于实际水平,从而影响到参保农民关于不同缴费档次对其一生收入影响的判断,并形成参保农民集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即使是在“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下,也只有参保农民的政策认知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可能为了最大化其一生收入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否则,参保农民的选择仍将是最低缴费档次。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参保农民对新农保的政策认知程度总体偏低,是总体样本中“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不显著的原因。而在较高政策认知程度分组的样本中,由于参保农民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差别化”补贴对其一生收入的影响,因此,“差别化”财政补贴将比“一刀切”财政补贴有效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显著为正;较低政策认知程度分组的样本中,参保农民不能充分认识提高缴费档次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因此“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无效,“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不显著。估计结果说明,如果参保农民政策认知程度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即使将“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转变为“差别化”补贴方式,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集中在最低档次的情况也无法得到有效改善。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新农保个人账户的财政补贴激励与政策认知程度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具有引导参保农民自发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效应,但这种效应的实现以参保农民政策认知程度的改善为条件,只有在较高的政策认知条件下,多缴多补的个人账户缴费“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才能够比“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显著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研究结论的政策涵义在于:通过“差别化”财政补贴激励来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必须以有效改善参保农民对新农保的政策认知程度为基础,否则,“差别化”财政补贴激励可能是无效的。

^①目前新农保规定个人账户资金按照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和实地调研经验,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将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的财政补贴模式正式确定为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补贴模式。首先,制定并出台具体政策在全国范围统一明确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模式,具体补贴方案由地方政府制定;其次,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补贴方案过程中,应按照“降低绝对补贴额同时拉大不同档次之间的补贴差距”的原则,在各缴费档次的财政补贴标准之间设置合理且有效的差距来确保方案的激励效应。例如,可以实行“100元补贴10元、200元补贴20元、300元补贴30元、400元补贴40元、500元补贴50元”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随着农民政策认知程度的提高,这类方案将在不大幅增加财政补贴规模的情况下,有效引导农民自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

第二,在试点地区的新农保宣传工作中,加强关于个人账户运作机理、补贴政策和未来收益等具体内容的解释工作,切实提高农民群体对新农保的政策认知程度。例如,可以以精算技术为基础,制订不同缴费档次、补贴标准和缴费年限所对应的个人账户积累规模与未来每月给付水平的图表,以直观、简易、具体的形式增强参保农民对个人账户的理解程度与信任程度,引导农民改善与提高对新农保制度的预期。

第三,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层管理和服务的队伍建设,规范包括新农保在内的各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和流程,通过增加经办透明度、公开财务数据等各种手段,提高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程度。调查过程中了解到,部分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如低保金发放不规范、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等一些列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整体的认知程度和信任程度。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增强行政推力、强化审计和社会监督等方式,不断完善和优化新农保管理和服务的流程与质量,是提高广大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认知程度的关键。

第四,完善新农保配套制度建设、优化新农保相关制度规定。首先,尽快建立新、老农保制度之间的衔接机制,有效完成老农保缴费与新农保待遇的对接,以降低老农保制度中止对农民社会保障收入预期的负面影响。其次,适时停止目前“捆绑式”参保的规定。目前多数农民对“制度实施时年满60周岁老人领取基础养老金,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的规定存在意见,尽管此项规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扩大新农保覆盖率的作用,但是却影响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本身的正确认识,因此,应该考虑适时完善或终止该项规定。

参考文献:

- 程昕、王国辉等. 新农保缴费问题的研究——基于阜新市彰武县4个乡镇的新农保调查[J]. 农业经济与科技, 2011 (6): 199-201.
- 黄明静. 农户参加新农保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蒙城县立仓镇的调研[J]. 长春大学学报, 2011 (5): 21-23.
- 贾宁、袁建华. 基于精算模型的“新农保”个人账户替代率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3): 95-101.
- 刘东燕. 广西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调查报告[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9 (12): 112-116.
- 刘军伟.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因素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 (4): 77-83.
- 潘书兰. 农户参加新农保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蒙城县立仓镇的调研[J]. 武汉金融, 2011 (4): 21-23.
- 桑军.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调查研究——以安徽省蒙城县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 (19): 14-16.
- 田北海. 农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1 (3): 50-58.
- 王海江. 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关于山东泰安市两个村农民的个案研究[J]. 人口研究, 1998 (7): 34-41.
- 王晓洁、王丽.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补贴效应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9 (4): 52-53.
- 杨军.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模式研究——以陕西省宝鸡市为例[J]. 西部财会, 2009 (9): 52-55.
- Ebenstein A and Leung S. 2010. Son preference and access to social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pension progra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1): 47-70.

(下转第13页)

源泉,但也是造成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而消费需求不足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中,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不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不仅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 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5).
-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GDP中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 经济研究 2009 (1).
- 李稻葵、何梦杰、刘霖林. 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0 (2).
- 罗长远、张军. 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4).
- 速水佑次郎.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华生.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低被严重误读——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报告之二[N]. 中国证券报 2010-10-14(A21).
- 张车伟、张士斌. 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5).
- 李扬、殷剑峰.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J]. 经济研究 2007 (6).
- D. Gale Johnson (1954) ,The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 - 1952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2) pp. 175 - 182.
- E. Phelps Brown and E. Hart (1952) ,The Share of Wages in National Income. *The Economic Journal*. 62(246) 253 - 277.
- Gollin D. (2002)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2) pp. 458 - 475.
- Nicholas Kaldor (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F. A. Lutz and D. C. Hague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 Keynes John M. (1939)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Economic Journal*. March pp. 34 - 51.

[责任编辑: 乔晓春]

(上接第46页)

- Green W. H. ,1997 ,*Econometric analysis* ,Prentice Hall 3rd edition.
- Hubbard R. Glenn. ,1984 ,Uncertain lifetimes ,pensions ,and individual saving ,Working Paper No. 13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Lind D. W. Marchal and R. Mason 2002 ,*Statistical Technique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Irwin: McGraw - Hill.
- Long S. ,1997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s ,Thousands oaks California Sage.
- Samwick Andrew A. ,1995 ,The limited offset between pension wealth and other private wealth: implications of buffer - stock saving ,Mimeo.
- Sherraden M. ,Schreiner M. & Beverly S. 2003 ,Income ,institutions ,and saving performance i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ccou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7(1) 95 - 112.

[责任编辑: 黄成礼, 张蕾]